

東征北伐抗日反共(上)

劉詠堯

黃埔建校六十週年的回顧與前瞻

前 言

中華民國前陸海空軍大元帥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由校長蔣公中正主持校務。本校全體師生數十年以來，在孫公與蔣公兩位革命領袖精誠感召之下，不斷發揚光大，以黃埔革命精神，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對國家社會貢獻甚多。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為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詠堯以第一期畢業同學身分，對東征北伐，抗日反共史事，略述梗概藉誌不忘。

蔣公校長辛勤策畫

歲月飄忽，時運交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自成立迄今，欣逢六十大慶。凡百創業，莫不艱難，幸賴蔣公校長，辛勤策劃，筆路藍縷，因陋就簡，於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籌備就緒，將校址設在廣州西南四十華里左右的黃埔島，以原來海軍學校舊址整修使用。當時學生人數定為三百二十四名，備取生三十名至五十名，課程以養成能作戰指揮士兵之連排長為目的。施教期間由於革命行動的迫切需要，暫縮短為六個月。

學校組織：在校長之上以中國國民黨總理兼本校總理。於校長之旁設黨代表一人；在校長之下設政治部、教授部、教練部、管理部、軍需部、軍醫部及辦公廳。黨代表廖仲愷、政治部主任戴傳賢、教授部主任王柏齡、總教官何應欽、教務部主任李濟琛、副主任鄧演達、總隊長沈應時、管理部主任林振雄、軍需部主任周枕琴、副主任俞飛鵬、軍醫部主任宋耀初、辦公廳主任張家瑞、翻譯王登雲。

五月三日孫大元帥下令，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五月四日，第一期正取生入校，包括在粵各軍保送的共四百九十九名，編為第一、第二、第三、三個隊；備取生一百二十人，編為第四隊。未久，陸軍講武學校第一、二學員隊學員共一百六十三人編為第六隊。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是陳炯明叛變，國父蒙難的二週年紀念。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選定這一天補行第一期開學典禮，國父親臨主持，儀式十分隆重。文武首長及各界領袖到了一千多人。國父在長篇訓詞中說：「從今天把革命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

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立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成功。」跟着特頒書面訓詞，由胡漢民代表宣讀：「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組織黨軍首先東征

蔣公當時兼任粵軍參謀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全體學生與第一及第二教導團的全體官兵，都向他請求，參加對陳逆炯明叛軍作戰。蔣公把這個請求提出滇、桂、粵三軍的「聯軍」會議，被聯軍會議否決。蔣公再託代理大元帥胡漢民轉呈國父。國父在北上旅途中回了電報准許參加，列入右翼軍的行列。於是兩個教導團，加上第二期學生組成的步兵總隊和一個砲兵營，以及第三期學生（入伍生營），一齊隨同右翼軍出發。

當時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請蔣公以該軍參謀長的身分指揮粵軍全部，蔣公謙辭。許崇智就把大部分粵軍撥歸他，以與軍校部隊並肩作戰。這

一部分粵軍，是第一師兩個旅，師長是李濟琛，第二師全部三個旅，師長是張民達，第三師兩個旅，師長是鄧潤琦。後來，代理大元帥胡漢民把直屬大本營的警衛軍（吳鐵城旅）和屬於海軍的陸戰隊都撥給蔣公指揮作戰。

蔣公於民國十三年冬，命令各部分頭出發，開始東征。其作戰計劃是：先行肅清廣九鐵路沿線的陳炯明叛軍餘孽，以後再繼續東征，消滅其他各地叛軍。十四年春天，國父在北京不幸逝世，蔣公在興寧縣召集我們官兵舉行追悼大會，他在致詞時，哀痛異常，聲淚俱下，全場官兵亦均感動流淚。

血肉橫飛克惠州城

十月間，爲了攻取惠州，蔣公以何應欽將軍爲攻城總司令，自兼攻城總指揮官。惠州城是三面環水，城牆高而且堅，自從宋朝以來未曾被任何軍隊攻破一次。蔣公深思良久，決定用砲放在城郊四週的高地，對準各個城門，並挑選敢死隊攻城，以砲作掩護。我得悉挑選敢死隊隊長，即報名參加，只因本身曾在數次戰役中負傷中了五槍，幸未中致命之處，當時大家那敢死隊如歸的熱忱，充滿在每個同學的心裏，我並下定決心誓言：「生爲中華民國之人，死爲惠州城下之鬼。」

對惠州城的總攻，是在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下午兩點開始，我係第四團連長，擔任敢死隊隊長，首先率全體隊員，衝至城牆下；我携手提機槍，從竹梯登在城牆之上，且向隊員招手趕快爬城。不料是時，敵人機槍射中我之左腦，墜落

城牆之下，負此重傷；昏迷不醒約兩日之久。越數日，據友人謂：從四點鐘起，我城牆前面戰壕中的士兵，又先後衝鋒了五次，最後一次每個隊員都帶了竹梯衝近城脚，冒著敵人猛烈的砲火攀登城牆，前仆後繼，大家一擁而攻上城牆，什麼生與死的觀念，早就忘得一乾二淨。惠州之戰，是國民革命戰史上極爲重要的一次攻城戰。當時情形，豈僅「血肉橫飛」而已，該用「驚天地，泣鬼神」六個字來形容，才符實況，到了十四日下午四點半才告這次戰圍勝利的結束。

興師北伐旗開得勝

蔣公於民國十五年六月開始北伐，是爲了完成國父的遺志，也是爲了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在當時北方各實力派的大概情勢：以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等是當時炙手可熱的三大軍閥，同時也是本黨（中國國民黨）最大敵人。而吳、孫盤據長江各省，與兩廣相接壤，虎視眈眈，尤爲國民革命的當前大敵。而本黨的友軍國民軍，則侷促於西北一隅，完全採取守勢。就當時情形觀察，本黨環境是相當困難的。蔣公爲什麼不顧當時的困難，而急急主張北伐呢？他以爲北伐是國父留給我們最重要的責任，無論如何艱難困苦，我們都必須及早完成的。他在告黃埔軍校同學書中說：「北伐未成，爲國父畢生之遺憾，且以此重託於中正者。故回省以來，竭力提倡，中正以爲無論何事，皆可捐棄成見，惟此北伐問題，非貫徹主張，則昔日同志之犧牲，皆成爲無意義之舉動。」

民國十五年六月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繼承總理遺志，剋期出師北伐，任命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持北伐軍事。國民革命軍重新改編爲八個軍，以何應欽爲第一軍軍長，譚延闓爲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爲第三軍軍長，李濟琛爲第四軍軍長，李福林爲第五軍軍長，程潛爲第六軍軍長，李宗仁爲第七軍軍長，唐生智爲第八軍軍長。蔣公於七月九日就職，並舉行誓師典禮。卽日下令動員，命唐生智兼前敵總指揮，由衡陽北進，第七軍李宗仁部隊及第四軍陳銘樞、張發奎兩個師分道由粵入湘，爲唐軍後援；轟轟烈烈北伐之幕，便正式揭開了。湖南民衆，久受軍閥的壓迫，望我軍之來，如久旱之望雲霓，所以軍行所至，民衆無不箪食壺漿以迎；且爲偵察敵情，擔任嚮導，幫助運輸，甚至參加作戰，打擊敵人，軍民合作的精神，已達到了最高峯。我軍的進展，因此極爲順利。故第四軍破敵於萍鄉，第七、第八軍都在永豐、衡山、湘潭等處連獲大勝。接着於八月十二日克復了湖南省會長沙，奠定了北伐初步勝利的基礎。

蔣公於八月中旬到達長沙，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進兵策略：以第四、第七、第八各軍爲中央軍，直趨武漢；第二、第三兩軍爲右翼軍，結合攸縣、醴陵，監視江西；新由黔軍編成的第九、第十兩個軍爲左翼軍，集中豐縣、津市，進迫荆沙；第一軍及第六軍爲總預備隊，隨中央軍推進；部署既定。八月十八日中央軍開始總攻，李宗仁率領中央軍的右縱隊，以秋風掃落葉的姿態，連

續佔領平江、岳陽、通城、羊樓司等處，再沿武漢鐵路向前追擊，又把崇陽克復。此時吳佩孚正在北方指揮進攻南口的國民軍，聽見兩湖方面大敗，便兼程南下，親自督戰，冀望挽回頹勢。但大勢已去，吳氏認為回天之方。八月底，汀泗橋和賀勝橋的兩次大決戰，我軍以壯烈的奮鬥，衝破了敵軍的主力，就進軍武昌，把城內的敵軍重重包圍。同時，唐生智率領中央軍左縱隊亦回側翼協攻，次第克復漢陽、漢口。吳佩孚退守孝感，我軍繼沿京漢路前進，連克黃陂、孝感。至九月十八日，更佔領武漢，敵軍殘部完全退出關外，又為我友軍樊鍾秀部所襲擊。武昌孤城於十月十日為我軍攻陷，擒獲敵將陳嘉謨、劉玉春，顯赫一時的三大軍閥之一的吳佩孚至此已到末日，我軍對吳軍行動暫時告一段落。

當我軍與吳佩孚軍酣戰之際，孫傳芳親視時，想坐收漁人之利。我軍攻克武漢後，孫即派盧香亭率軍出師修水、平江，圖擾我軍後路；另派王普等部沿江西上，進窺武漢。蔣公時在湖北督師，接得報告，以先發制敵計，便電令原在醴陵一帶監視孫傳芳的第一、第二兩軍，向萍鄉開拔，進攻宜春、萬載；又調第六軍由湖北咸寧折回通城，趨修水；第一軍自湖南岳陽轉趨瀏陽，出銅鼓；又令第十四軍賴世璜部隊進攻贛南，以收夾擊之效。

在各路軍開始總攻擊時，賴軍又克復贛州，再克吉安。而其他各軍，亦陸續克復清江、高安、修水。我軍已臨南昌城下，敵軍萬人憑城堅守，雙方肉搏，傷亡慘重。我軍以撫州方面殘軍，

未盡殲滅，回兵堅城之下，側背不無顧慮，乃撤南昌之圍，改向南海路進攻，而以主力趨撫州，收復撫州。先後佔領九江、德安，南昌又在我軍大包圍中，卒於十一月中旬攻克。曾擄敵軍師長數名，敵軍被繳械者數萬，孫傳芳的主力大都消滅，江西完全肅清。我北伐軍以風捲殘雲之勢，於短短的期間內，能掃蕩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乃是我黃埔軍校各級幹部與國民革命軍全體官兵充分顯露了大家忠義的戰鬥精神與英勇的鬥志。

清黨安內繼續北進

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汪精衛由俄返滬，正值我國民黨與共產黨形勢極度緊張之時，蔣公親往歡迎，勸他堅定革命立場。四月五日，汪却與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主張國共兩黨繼續合作，隨即潛往武漢，做鮑羅廷的第一號傀儡去了。當時本黨中央監察委員有三分之二人散在上海，經由委員吳敬恒揭發共產黨之罪惡與陰謀，於是召開會議，以非常緊急措施，遏止亂萌。蔣公遂於四月十二日起，開始執行「清黨」；解散上海工人糾察隊，破獲共產黨機關，逮捕共產黨首要，並通令南京、廣州等處照樣執行。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五月五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及各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任鄧澤如、段錫明等為委員，規定清黨時停止入黨，所有黨員須經三個月之審查始發黨證，期將黨內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及一切腐化惡化的反動分子，乘勢一律

清除。

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特任校長蔣公為委員長。二十二年夏季，蔣公創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從此每年一次召集軍政幹部，研究國民革命的形勢，討論對內對外的大政方針，勵志養氣，自強不息，準備與國內外一切反革命惡勢力奮鬥到底。蔣公以廬山訓練和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建軍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不過，黃埔軍校各級幹部的使命是完成第一期革命的責任，而當時廬山訓練的使命，是要繼續完成第二期的革命責任，就是先要消滅赤匪，掃除我們國民革命的障礙，再來收復失地，完成安內攘外之大業。其後江西共軍的肅清，與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是這五年廬山暑期訓練奠其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為一重要的樞機。復於二十四年雙十節，蔣公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一面使各個人成為現代的國民，以為建設國家精神的基礎；一面以羣策羣力，來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盡到勞動的義務，發展民族生產能力，以為建設國家物質的基礎。由於武昌、南昌克復，我軍乘勝追擊，遂於十六年六月一日與國民軍會師於鄭州。這一役，以一個多月的時間，肅清了江蘇、河南兩省的敵人。

攻克北平完成統一

蔣公中正於民國十七年春初，在各方一致致促之下，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總司令（即國民軍改編），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為第四

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爲國民革命總司令部參謀長。其作戰計劃；第一集團軍擔任津浦線，第二集團軍擔任京漢線；第三集團軍擔任京綏及京漢線之西面；第四集團軍則西上平定湖、鄂之叛軍後，沿京漢線北上，與第二集團軍協同作戰，而以會攻北京爲總目標。先是我軍於龍潭棲霞山之役破敵後，就乘勝北追，再度佔領徐州，繼分路進攻山東省濟南城，於四月二十七日佔領泰安，大破張宗昌、孫傳芳聯軍主力，五月一日遂乘勝克復濟南。濟南之捷，不但結束了孫傳芳最後掙扎，同時也註定了奉系軍閥必敗的命運。日本帝國主義者素以奉系軍閥爲宰割中國的工具，奉系一倒，他宰割中國的陰謀，勢必大受打擊。所以我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不但使北京的張作霖恐慌，東京的日本軍閥也同時震慄。在五月三日，我軍佔領濟南後，正準備渡河北上時，日軍突襲我軍營房，以謀破壞，企圖阻止我軍前進，這就是「五三慘案事件」之發生。蔣公洞燭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所在，乃嚴誡我軍官兵，須「忍辱負重」，勿墮敵人陷阱；蓋中國欲收回國土，洗雪恥辱，非「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爲功也。後來濟南事件由外交途徑解決。

五月十六日，我第一集團軍繞道渡河後，即與第二集團軍會合佔領德州，六月二日又佔領滄州。第三集團軍由山西入河北，於五月中旬連克平山、靈壽、正定、獲鹿、石家莊。白崇禧亦奉命率第四集團軍由京漢路北進，結集於正定一帶，協助作戰。第三集團軍於三十一日佔領保定，與第一、二集團軍完成對京津的大包圍。張作霖見

大勢已去，不顧日人之威脅勸阻，於六月二日深夜，由北京乘特別列車倉皇出關。日本人憤憤之餘，預埋炸彈於南滿鐵路皇姑屯車站，炸斃了張作霖。奉軍紛紛退却，我軍遂於八日接收天津，並將北京改名爲北平。北伐軍事，至此告一段落。上距廣州出發，尚不滿兩年，成功之速，不特爲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亦爲世界戰史上所罕見。至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關外的張學良實行易幟，通電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全國統一，於此完成。

抗日剿共勝利還都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當時日本軍閥不但擁有全世界最精銳的陸軍，而且有新式式的海空軍。這種情形，可謂是以弱對強。但我們不顧一切，奮起抗戰，在持久戰方針指導下，阻止敵人之攻勢，消耗敵人之力量。八月十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進攻，八十四淞滬戰役由此而起。其後日本軍隊陸續增至三十萬人，我軍亦毅然以主力使用於淞滬戰場。因上海是我國經濟重心，中外輿論所繫，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抵抗。雙方作戰重心，乃由華北移至華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長江下游工廠物資，得以內運，國際觀瞻亦爲之一新，所獲戰略上之成效尤偉。

「八一四」一役，對抗戰有莫大的貢獻。那天我們空軍在杭州上空，以壹比陸，獲得了空戰的大勝利。這次空戰，精神方面影響極大，對於中國的抗戰意志和必勝信念，其價值是無可限量。

的。因此我們在士氣上，已經取得了先聲奪人的地位，消除百年來一貫的對外失敗主義，這種精神的收穫是無可比擬的。

蔣委員長於三十一年二月訪問印度，並發表告印度人民書，希望中印兩大國同爲自由而努力；對於英國致誠摯之期待，相信必能從速賦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實權。全印各黨派表示熱烈歡迎，認爲蔣委員長有此權利與義務，提出解決印度政治問題之卓見。國際間對蔣公所表現之政治家高尚風範，均致崇高之敬意。八月間蔣公復巡視西北、新疆等處，獲得他們熱忱的擁護中央，於是後方根據地完全鞏固。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間，蔣委員長與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俄國史達林書記，四國領袖在非洲埃及尼羅河畔，首次晤面，懇談遠東大局種種問題。會議結束，發表開羅宣言。他們同意要制裁並懲罰日本侵略行爲。日本應將從中國奪去的東北和臺灣歸還中國。四國並同意於相當時期內，予朝鮮（韓國）以獨立的地位。

開羅宣言發表以後，中外輿情莫不稱頌爲中國外交上空前之勝利。

蔣公說：「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羣島爲已經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領土，而獲得美英共同聲明歸還我國，而且承認朝鮮於戰後獨立自由，此皆爲國民革命之主要目標與期望，而今竟能發表於開羅宣言中，實爲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抗戰勝利以後，不平等條約是撤廢了。我們中國得到了獨立自由的地位，本可以發展交通和

工礦生產事業，使國民安居樂業，致國家於富強。但是蘇俄帝國主義役使他的第五縱隊中共奸匪，來破壞我們的鐵路和礦業，阻止我們的復員和建設，繞演成農村破產城市恐慌的景象，招致社會瓦解，國家危亡的災禍。」蔣公又說：「我們中國近三十年的趨勢，最主要的就是農業已趨凋敝，工業未能達成順利發達。舊社會組織瓦解，新社會組織尚未有形成。抗戰八年之後，繼之以全面匪亂，我們社會的瓦解，便格外的迅速。這一嚴重的社會病態為俄帝侵略工具中共匪徒所乘，便造成大陸淪亡慘禍的主要原因之一。」

東北華北中共叛亂

在東北先後擔任行營主任與剿匪總司令的人，對則匪策劃已加強，但有幾項措施尚欠妥當。我以為他們(一)對蔣公收編偽軍的指示，延未執行。蔣公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的一篇演講，其中有下列一段話：「關於游擊隊與偽軍的裁併與改編，希望軍政部在一個月以內有具體的事實表現。」此點，應該做到。(二)林匪彪於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便已糾集了二十幾萬人，開始進攻錦州，而守軍負責人於十月五日才命令五個軍由瀋陽前往營救。這龐大兵團，未直接經遼中線，溝幫子，直赴錦州，却耗費兵力與時間，以五十二軍南攻鞍山與海城、營口，以八十三軍與八十九軍向西北攻彰武，祇用七十一軍一個軍攻臺安與新立屯，然後折向西南，在十月二十三日「進出黑山東北」。這地方離開錦州頗遠，錦州却在十月十五日便已陷落；其後，十

月二十六日，一部分的部隊回軍向東，增援瀋陽，又未敢走直路，而繞走新立屯東北的彰武，在彰武遇到「三倍於我之敵」，瀋陽遂於十一月二日淪陷。

原守北平的華北軍總司令在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向中共軍隊投降，說是「局部和平」。有人說，他之所以如此，由於天津在一月十五日已被共軍攻佔，張家口一帶的軍隊又被切斷，調不來北平。又有人說，雖則杜魯門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因他們國會的壓力而指定以四億美元援華。在這四億美元之中，則有一億二千五百萬元軍援專款，然而經手撥款、買軍火、輸運軍火的若干人，從中竭盡刁難之能事，到了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才有一批指定直接運來給總司令的，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的軍火到達天津，我方拆開一看，箱子裏面的槍械等等，缺乏零件，不堪使用，總司令於是對自由世界的前途，深感失望。

徐蚌會戰錯失機先

徐蚌會戰，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樁大事，第四十四軍奉命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由海州撤退，向西到徐州集結，中途遇到共軍，被阻，第七兵團有五個軍奉命由徐州向東去，迎接第四十四軍。第七兵團走到隴海東段的運河站，遭遇共軍，激戰，不利，於十一月九日退守碾莊車站及其附近，被圍，戰到二十二日，第七兵團以殘部三個團突圍，遇阻，這便是「碾莊之戰」，徐蚌會戰的第一階段。

共軍乘勝佔了宿州與靈璧縣。

第十二兵團奉命由河南來安徽，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到達宿縣西南的雙堆集，與共軍遭遇，被圍。激戰到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二兵團突圍，失敗。這便是雙堆集之戰，徐蚌會戰的第二階段。

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第十三、第十六等三個兵團由徐州南下，救援在雙堆集被圍的第十二兵團，於十二月七日在蕭縣西南的青龍集一帶，與共軍十三個縱隊遭遇，被圍。十二月九日，大雨大雪；此後，直至次年一月十一日戰敗為止，天氣未曾好轉過，國軍的飛機無法為有效的支援。

第二兵團擊潰了共軍的第三縱隊，共軍仍有十二個縱隊。第十三兵團，對共軍拚死作戰，傷斃了極多共軍。第十六兵團曾向蔣公建議突圍，蔣公允准以一軍一師為單位，分別突圍，以保存此時國軍僅餘的主力。

徐州剿匪總部負責人於轉下命令以後，中途變卦，派人追令業已於十一月六日突圍的第十三兵團與第十六兵團，叫他們回軍青龍集。第四十一軍七八千人，此時已經突圍，到了河南永城。第十六兵團率數百名人員，也已經進入黃汛區，其後到達武漢，第十六兵團的其他兵員，都完全被傳令者追了回去，其後與兵團全部及第十三兵團的極大部分，被消滅於青龍集。

徐蚌會戰挫折的另一原因，則是我們的防諜工作有欠嚴密之處，當時共諜劉斐（一名劉為章）潛伏在國防部，主管作戰計劃，暴露了國軍的有關作戰機密，這是今日我們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

劉斐毛曾包藏禍心

走筆至此，猛然回憶起民國十二年秋天，我自湖南抵達廣州，擬投考黃埔軍校肄業，當時我遵先叔祖父之囑，函劉斐問安，因他係我的同族叔輩，當時他就讀於西江講武堂，我在信封內稱他為章叔，信封外稱劉匪先生收，未久，接叔祖父函告：昨接為章來函謂：「詠堯來信，稱我劉匪，我誠不敢當矣……」我閱後，自知曾稱他為劉匪，係屬筆誤，並無他意；不意經過二十三年之後，劉斐真的成了劉匪。抗日勝利還都時，軍委會改組為國防部，我曾任次長；民國三十五年當全面整軍積極進行之際，亦是共軍各處叛亂加緊之時，我曾先後根據各種情況，晉謁委員長蔣公數次，陳明劉次長斐確有匪謀嫌疑，不宜派他繼續主管作戰計劃；蔣公據報後，均一再詢問考察，迨徐蚌會戰，局勢對我日益不利時，蔣公會謂：你說劉斐具有匪謀嫌疑，似乎不錯；因鄭介民昨日下午來見，對於此事亦已言及云。由此，可知我們曾在大陸剿匪軍事的挫折，原因頗多，而我們對於匪謀未有嚴密防範，亦是事實。

其次，我又想起毛澤東民國三十年在重慶數度晉見委員長蔣公，其目的在偽裝與蔣公商討聯合作戰，以期早日消滅日軍，同時，他還連續發表言論，宣揚共軍服裝十分粗陋，生活特別艱苦。其實，毛曾對我國軍在表面上希望聯合抵抗日軍；實際上，他們暗中與日軍經常勾結，打擊我軍，我們在此情形之下，與他正式交易，無異與虎謀皮。因此，今天我指出當日毛曾澤東在重慶時，假

如我們不顧其他不便，將他軟禁，使其無法復返延安，然後我們在各方面將共黨全部分別撲滅，則我們可能不至於抗日勝利之後，三十多載，尚滯留於臺灣。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抗戰勝利還都後，國軍

剿匪軍事尚未停止，尤其黃埔軍校同學們的戰術技術、作戰精神正在磨練發揚。但共黨叛亂範圍，日益擴大，故於徐蚌會戰之後，其他各地戰況相繼惡化，至民國三十八年多，全國剿共軍事，不幸失敗。（下期續完）

談「戴笠與軍統局」的名著

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

鐵血精忠傳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關山煙塵記

海隅叢談

「浩然集」

四巨册合訂為

二千餘頁，一

百多萬字，豪

華精裝，定價

臺幣捌佰元郵

撥一四〇四四

號中外雜誌社